

# 简论司马相如散文的特色

陶启君

司马相如(前179—前118),字长卿,蜀郡成都(今四川成都)人。他是我国西汉著名的辞赋家。其代表作《子虚赋》和《上林赋》等将汉赋推向了高峰,使这种文体成为一种固定形体。扬雄推崇说:“如孔氏之门用赋也,则贾谊升赏,相如入室矣。”(《法言·吾子》)鲁迅说:“赋莫若司马相如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,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然而,司马相如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辞赋家,而且还不愧为卓有成就的散文家。其散文完整地保留至今的有《喻巴蜀檄》、《难蜀父老》、《上书谏猎》(又名《谏猎疏》)和《封禅文》等四篇,皆不失为文学宝库里的璀璨明珠。另有《答盛贤问作赋》《报卓文君书》,均残。他如《遗平陵侯书》、《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》以及《荆轲赞》(《艺文志》作《荆轲论》)等,俱亡佚。对司马相如的散文,历来重视不够,有的甚至把它们归于赋类(如高步瀛《古文辞类要笺证》)。笔者认为,司马相如的散文在表现形式上有辞赋倾向,但毕竟自有其特点。

一、吴辟疆说:“西汉文章之盛,气体雄直,而奇文奥旨,是以运其气而举其词,巍然浩然如山海之富,而蛟龙万变,皇惑出没其中。盖扬马于斯,尤为极轨,此文章之瑰伟大观也。”(转引自高步瀛《古文辞类要笺证》)。奇文奥旨,微言大义,是司马相如散文的第一个特色。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散文的讽谏意义和深含人生哲理的警句的运用上。

《难蜀父老》一文的意旨,主要是驳斥蜀父老对通西南夷的诘难,讲明朝廷实行通西南夷的策略是当务之急。《喻巴蜀檄》围绕“计深虑远,急国家之难,而乐尽人臣之道”立论,对通西南夷的意义和目的也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。这一见解对促进当时各民族的交流和合作,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。因此李充在《翰林论》中说:“盟檄发于师旅,相如《喻巴蜀父老檄》可谓德音矣。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597引)与此同时,在《喻巴蜀檄》中对唐蒙“发军兴制”、“郡又擅为转粟运输”,致使蜀民震恐的作法予以指责;在《难蜀父老》中又非常巧妙、曲折地涉入另一层意思,那就是借耆老大夫之诘难,向武帝申诉蜀民之劳苦,说:“今罢三郡之士,通夜郎之涂,三年于兹,而功不竟,士卒劳倦,万民不赡,今又接之以西夷,百姓力屈,恐不能卒业……”当然,这并非以此反对通西南夷,而是希望皇上能采取明智的措施,不要使人民“劳倦”。对汉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,准备从滇蜀通往西域,派唐蒙为中郎将,后又遣相如为中郎将入蜀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说:“相如使时,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,大臣亦以为然,相如欲谏,业已建之,不敢。乃著书借蜀父老为辞,而已诘难之,以讽天子。”这正说明了相如散文所深含着的讽谏意义。

相如散文含义深刻,还表现在深含哲理的警句的运用上。这些警句,言简意赅,委婉含蓄,耐人寻味,发人深省。如《难蜀父

老》一文，在驳斥耆老大夫之诘难时，用以下一段作为全文的总论点：“盖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；然后有非常之功。”启示我们要办好一件异乎寻常之事，要建立不同寻常的功绩，既要有远见卓识和魄力，又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缔造过程。又如《上书谏猎》最后写道：“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，祸固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所忽者也。”以小见大，防微杜渐，是发人深省的。正如吴楚材、吴调侯所评说：“末后反复申明之，悚然可畏之中，复委婉易听，武帝所以善之也。”（见《古文观止》）就是在《封禅文》这样的为汉王朝歌功颂德的文章中也提出了“兴必虑衰，安必思危”的见解，道出了兴与衰，安与危的关系，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。这些“超越常言，独标荇颖”（黄侃《札记》）的句子，不仅使文章说理透辟，而且使文章显得言近旨远，让读者从中体会到无穷的文外之旨，从而“欢然内恻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），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。

二、刘勰说：“檄移为用，事兼文武”，“其植义飏辞，务在刚建，插羽以示迅，不可使辞缓，露板以宣众，不可使义隐；必事昭而理辨，气盛而辞断，此其要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）事昭理辨，气盛辞断，是司马相如散文的另一个特点。所谓“事昭而理辨”，就是论述问题富有逻辑性，能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；所谓“气盛辞断”，即文辞剀切，用笔纵横驰骋，使文章具有鼓动性和说服力。

在《难蜀父老》中，司马相如运用了立论和驳论相结合的论证方法，采用宾主答问的形式，借耆老大夫之口，从反面提出论点，诘难通西南夷是“事无用”，然后“使者”针对耆老大夫之诘难，用警句为树立自己的总论点，再针锋相对，博引过去及现在的事实，反复说理，层层深入，步步紧逼，加以

驳斥，很有说服力。而在《喻巴蜀檄》中，则针对所论问题全面展开分析。一方面指出通西南夷是正确的，因为西南夷“常效贡积”、“山川阻深，不能自致”，“故遣中郎将往宾之”，另一方面指斥中郎将唐蒙惊扰百姓的错误；一方面重申“陛下之意”，另一方面又指出被征发的巴蜀人“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，亦非人臣之节也。”两文几乎阐述的是同样一个主题思想，而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法，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，可谓异曲同工。刘勰说：“檄者皎也，宣露于外，皎然明白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）通过不同的论证方式，做到了“事昭而理辨”，自然也就使文意“皎然明白”了。

相如散文也象他的辞赋那样，运用了敷张扬厉、纵横驰骋的手法，使文章“气盛辞断”既有说服力，又有感染力。如在《难蜀父老》中，作者为了说明汉德广博，极力铺叙，纵横驰骋。他写道：“故北出师以讨强胡，南驰使以消劲越。故乃关沫若，徼泮河，缕灵山，梁孙原，创道德之涂，垂仁义之统。”篇幅短小的《上书谏猎》，同样运用了这种铺叙手法，清人李兆洛评曰：“发端雄奇，敷陈恳到，有屈刃为镜之妙”（《骈体文钞》）。一开始就写道：“臣闻物有同类而能殊者，故力称乌获，捷言庆忌，勇期贲、育。臣之愚暗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。今陛下好凌阻险、射猛兽，卒然遇犝才之兽，骇不存之地，犯属车之清尘”，由远及近，从人各有所短长，再推及动物也有“犝才”“殊能”，最后落脚于作者要说的正题上来。这种纵横驰骋的方法的运用，使文章气势磅礴，语言畅达，感情激烈，内容突出，道理阐述得更加充分。

三、刘勰云：“相如之《难蜀老》，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）鲁迅说司马相如“不师故辙，自摅妙才，广博闳丽，卓绝汉代。”（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这些既是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，又是

对他的作品写作特点的概括。文晓喻博，句式多变，是相如散文又一个特点。

司马相如散文常常用人们熟悉的、具体的、浅显的事物作比，说明抽象的、生疏的、深奥的道理，即比喻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。如《难蜀父老》写西南人民向往汉德，说他们是“举踵思慕，若枯旱之望雨”，“二方之君，鳞集仰流，愿得受号者以亿计。”把汉武帝的措施意义远大和耆老大夫的眼光如豆，形象地比之为“犹鹪鹩已翔于寥廓之宇，而罗者犹视乎藪泽。”在《上书谏猎》中说武帝嗜好射猎的危险到了什么程度，用“是胡越起于穀下，而羌夷接軫也”作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，艰深的道理浅显化，给人以具体、形象、鲜明、生动的感觉。黑格尔说：“艺术的要义一般就在于意义与形象的联系和密切的吻合。”（《美学·象征型艺术》）看来，司马相如是懂得这一要义的。

司马相如的散文能有较好的表达效果，还在于行文句式多变，毫不板滞。他常在散文中夹杂着一些对偶句，使文句骈散相间。例如“创道德之涂，垂仁义之统”，“偃甲兵于此，息讨伐于彼”（《难蜀父老》）；“前有利兽之乐，内无存变之意”（《上书谏猎》）；“君莫盛于唐尧，臣莫贤于后稷”（《封禅文》）等等。这些对偶句巧妙地运用于一般散文中，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力量，有天风海雨逼人之感；同时把相对或相反、相关或相连的两部分意思突显出来，使其互相补充，互相映衬，从而加强了语气的感染效果。

司马相如还常在一般陈述句中插用一些反诘句来表示肯定的意思。如《难蜀父老》“且夫贤君之践位也，岂特委琐喔嚙，拘文牵俗，循诵习传，当世取说云尔哉？”“盖闻中国有至仁焉……今独蜀为遗已？”“戾夫为之垂涕，况乎上圣，又焉能已？”等等。在《封禅文》和《喻巴蜀檄》等文中也

多处用到反诘语，这些反诘语为加重语气，强调自己观点和结论的正确性，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，具有重要作用。

四、司马相如散文在散文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，促进了汉代散文趋于成熟，但又与同时代的散文作家如司马迁、贾谊等有不同的特征。

先秦历史散文对后代是很有影响的。

《左传》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，后来散文家叙事和作议论文字，都常以它为楷模。其显著特点是委婉含蓄，“语微婉而多切”（刘知几《史通·言语》）。司马相如散文中那种含蓄、委婉的暗讽风格，是《左传》等先秦散文与辞赋的影响相结合的产物。《战国策》在文笔上长于铺陈，有声有色，它不同于《左传》那种曲折地历史记事或委婉的外交辞令，而是纵横捭阖，驰说云诵，雄辩恣肆的谋夫策士之辞。在司马相如的散文中也不难看出《战国策》这种写作特点的遗迹。同时，司马相如散文还发扬了先秦诸子散文的优良传统。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“深于比兴”，“深于取象”（《文史通史·易教下》），也就是比喻手法的运用。能够引物连类，阐明道理，即使是讲抽象的理论，也都富于形象性。这在相如散文中也表现得很明显。

司马相如散文与同时代著名散文作家相比具有不同特征。贾谊是西汉初期的政治家、辞赋家和散文家，他的散文（如《治安策》等）大胆地揭露社会的矛盾和危机，笔锋犀利，言辞激切，感情强烈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则“厚集其辞，郁思奋势”（《骈体文抄》卷十九），“志气槩桓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）。这些都是与司马相如散文的上述特征迥然不同的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文系学生）